

从《戴维营协议》到《亚伯拉罕协议》看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式微

王 建

1978年9月17日，埃及和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1979年3月26日，埃及、以色列和美国签署《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和以色列的和平条约》。1994年7月25日，以色列和约旦签署《华盛顿宣言》，10月26日双方签署《约旦-以色列和平条约》。2020年9月15日，以色列与阿联酋和巴林在美国白宫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10月23日，美国、苏丹、以色列发表联合声明，苏丹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从埃及到约旦，再到阿联酋、巴林和苏丹，相信还会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此发展趋势既反映了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也折射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式微。

一、阿拉伯民族主义目标与理念的演变

从16世纪开始，阿拉伯人处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到了19世纪中叶，一些阿拉伯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受到两股思潮的影响，一是奥斯曼帝国内的泛突厥主义思潮，二是西方民族国家思想，提出了基于共同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因素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萌芽最早出现在叙利亚和埃及，目标是争取阿拉伯人在奥斯曼帝国内自治。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向阿拉伯人许诺，打败奥斯曼帝国后，阿拉伯人将在肥沃新月地带和阿拉伯半岛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于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加入到协约国一方，提出建立独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的目标。但是，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1916年5月，英国人与法国人签署了《塞克斯-皮克协定》，瓜分了西亚的阿拉伯人地区，实行委任统治。

两次大战期间，随着一些委任统治地相继独立，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已不可能，阿拉伯民族主义追求的目标和思想内涵发生了变化。阿拉伯民族主义从追求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转而强调阿拉伯国家的团结，即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各个领域的合作，1945年3月阿拉伯国家联盟应运而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进入新的高潮，反对殖民主义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核心理念。阿拉伯国家认为巴勒斯坦问题是殖民主义遗留问题，而以色列则是

是殖民主义的产物。以色列建国后，拒绝承认以色列，反对以色列的存在，成为阿拉伯国家的共识，于是爆发了第一次阿以战争。从此，以巴勒斯坦问题为核心的阿以问题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外交领域的首要问题。

二、阿拉伯国家对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战略变化

巴勒斯坦问题是影响中东政治稳定的根源性问题，以色列是阿拉伯世界共同的敌人，一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解决以巴勒斯坦问题核心的阿以问题是阿拉伯国家外交的首要问题。但是，阿拉伯世界的现实是分裂的，几个有影响的阿拉伯强国都试图“打出巴勒斯坦牌”^①来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从联合国通过巴以分治决议及随后的第一次阿以战争开始，巴勒斯坦问题就成为了某些阿拉伯国家手中的牌。阿拉伯民族主义所倡导的追求阿拉伯世界团结与统一的理念，阿拉伯世界支持巴勒斯坦人争取民族权力的斗争，在阿拉伯国家的国内政治斗争和地区地缘政治竞争中成为被利用的工具，一是某些阿拉伯国家利用之争取在阿拉伯世界的话语权，进而成为中东地区事务主导者；二是为了维护政权的合法性。

1952 年革命后的埃及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中心，纳赛尔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但是，埃及的领导地位一直受到叙利亚、伊拉克等国的挑战。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几个阿拉伯大国都想获得主导权。阿拉伯国家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战略根据地区形势和本国需要而不断调整：其一，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目标从巴勒斯坦难民回归逐步演变成建立巴勒斯坦政治实体、巴勒斯坦自治、巴勒斯坦建国；其二，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受制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转变成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不再完全受制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

第一阿以战争后，约旦占领了包括东耶路撒冷的旦河西岸地区，埃及占领了加沙地带，但是，声称消灭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阿拉伯人国家的约旦和埃及都没有在其占据的地区建立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国家，阿盟首脑会议只是把巴勒斯坦问题看成是难民回归问题。当以阿拉法特为代表的巴勒斯坦人试图以武装斗争争取民族合法权利的时候，阿拉伯国家最初的反应是反对与限制，后是欲将巴勒斯坦人武装纳入到自己的控制之下。数个阿拉伯国家在巴勒斯坦人中都有自己支持的武装派别，巴勒斯坦人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没有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1967 年第三次阿以战争，约旦和埃及分别失去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此后，要求巴勒斯坦自治、建立巴勒斯坦国家才提上了阿拉伯国家的议事日程。

阿拉伯国家在第三次阿以战争中的惨败使阿拉伯民族主义受到质疑，其影响开始走下坡路。在阿盟喀土穆峰会上提出了对以色列的“三不原则”，即“不和解、不谈判、不承认”，但面对现实，阿拉伯国家开始调整战略，埃及首先迈出了第一步。

三、从《戴维营协议》到《亚伯拉罕协议》

经历四次阿以战争，阿拉伯国家未能消灭以色列，未能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以色列的国力越来越强，而战斗在对以色列斗争第一线的埃及的经济状况却越来越糟糕。

1977年11月9日，是改变中东历史发展轨迹的一天，也是改变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进程的一天。萨达特突访耶路撒冷并在以色列议会发表演讲。埃及最终与以色列达成《戴维营协议》并签署和平条约。埃及与以色列谈判，萨达特最初要求将埃及和以色列两国的协议与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捆绑在一起，为永久和平打造一个坚实的框架。而贝京希望只谈西奈，尽可能不涉及巴勒斯坦问题。戴维营谈判的结果是，以色列放弃了西奈半岛，但保留了对约旦河西岸的控制；埃及收回西奈半岛，萨达特成为和以色列实现和平的第一位阿拉伯国家首脑；巴勒斯坦人只得到一个不确定的未来自治以及未来最终地位安排的画饼。萨达特“出卖了巴勒斯坦人”^②，突破了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三不原则”。萨达特转变政策的根本原因是其认识到，以阿拉伯世界团结为宗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未能维护埃及的国家根本利益——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十月战争后，“从经济上看，埃及国家只能维持生存，甚至这都不能维持了。埃及越来越多的人口需要经济的重大突破。”^③萨达特调整经济政策，实施开放政策，试图通过广泛的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吸收外国投资。但是，经济调整政策并未完全成功，尤其是通货膨胀严重，这“促使萨达特寻求另一种国际突破”^④。萨达特与以色列媾和遭到阿拉伯国家的谴责，但埃及开始每年得到来自美国的数十亿美元经济和军事援助。

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地缘政治剧变。昔日的阿拉伯强国如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国力大衰（伊拉克在美国的打击下已先行衰落了），阿拉伯世界的重心转向沙特和阿联酋为代表的海湾君主制国家。在现阶段，海湾国家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从外部看，海湾国家在阿拉伯世界的中心地位几无挑战力量，其面临的挑战是来自阿拉伯世界之外，即伊朗和土耳其；其二，从内部看，

海湾国家依赖石油维持庞大的财政开支出现问题，他们看到了后石油时代必须以经济多元化来支撑国家的经济发展，故而将经济多元化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于是，阿拉伯国家的首要国家利益变化了，伊朗成为其首要安全威胁，经济多元化是其首要发展目标。

国家的首要利益变化了，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也就变化了。过去是通过高举阿拉伯民族主义大旗，在巴以问题上掌握话语权，提升自己在阿拉伯世界乃至整个中东的地位，并且依靠丰富的石油收入来维持这种地位。但在低油价时代，这是不可持续的。现在更多的是通过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来提升自己的地位，这种综合实力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因此，巴以问题已经不再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不可逾越的障碍，巴以问题边缘化以及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是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必然结果，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可以预期，在阿联酋、巴林、苏丹之后，会有阿拉伯国家跟进，目的只有一个，为了国家利益。

四、为了国家的利益，阿拉伯民族主义式微是历史发展趋势的结果

阿联酋和巴林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其首要目的通常被理解为与以色列结盟遏制伊朗的威胁，其实不尽然。从萨达特首先向以色列伸出橄榄枝，寻求外交突破，到阿联酋和巴林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我们看到一条主线一脉相承，即通过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获得好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

以色列和阿联酋作为中东两个经济大国，在资金、市场、技术和能源等诸方面具有极强的互补性。以色列的高科技有助于阿联酋推动经济多元化的发展战略，阿联酋可以使以色列获得稳定的能源供应和资金支持。在疫情期间，双方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应对公共卫生产业链危机。疫情使双方认识到加强合作应对突发危机的重要性，加快了双方关系正常化的步伐。

从关系正常化以来双方的交往上看，更多的是集中在经贸往来，如航班直飞、商贸代表团访问、签署出口信贷合作协定等，而不是在针对伊朗的安全威胁上做出某种安排。正如以色列商会联合会主席乌里尔·林恩说，亚伯拉罕协议为两国开启了社会经济机遇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意味着长期影响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阿以矛盾与冲突开始让位于阿以合作，使中东和平进程迈出的重要一步。同时，巴以问题进一步被边缘化，不再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不可逾越

的障碍。

总之，国家利益决定了外交取向，阿拉伯民族主义在以国家构成的阿拉伯世界走向式微是必然的。

（王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信息室主任，本文根据是作者在2020年10月24日中国中东学会年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① 【英】伊恩·布莱克：《邻居与敌人——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1917-2017》，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200页。

② 【以】丹尼尔·戈迪斯：《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09页。

③ 【美】詹森·汤普森：《埃及史——从原初时代至当下》，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26页。

④ 同上，第327页。